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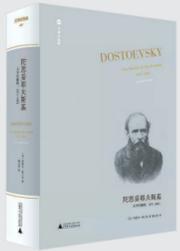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全书旨在通过影像、史实、细节的力量,让读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气质有更深的了解,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红色气质》 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 编著 商务印书馆 2022年3月出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间写作了《少年》《作家日记》及其登峰造极的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并最终赢得了他一直渴望的普遍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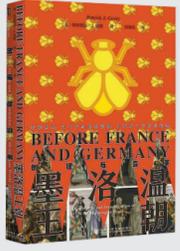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小人物的悲欢凝聚出恢弘的时代,时代的阴影之下是小人物的生活况味。这本书不仅彰显了作者的悲悯情愫和家国情怀,又以精良的文笔和独特的神韵触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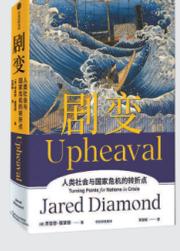
《小人物走过大时代》 梁晓声 著 东方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作者试图打破主导现代学术的历史学、民族志和社会学学科的传统观点,跳出罗马的分类标准,深入法兰克王国最初的时期——墨洛温王朝,去阐释一段最难以阐释的欧洲历史。



《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 [美]帕特里克·J·格里 著 郭建龙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危机与剧变总是结伴而行。戴蒙德的危机应对方案或许可以帮助人类重塑危机意识,毕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要不断进行选择性变革。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妙手缀珍:西方珍本书和中国藏书印

绿茶

因为爱书,我爱一切关于书的书,这类书的作者无疑是我同类,他们有的是爱书人,有的是藏书家,还有从事跟书有关事业的人,比如编辑、出版家等等。读这类书,让人有种心照不宣的快感,很多情感、很多痴情和任性,都无需多言,作者也不爱多交待,就是那种“你懂的……”

《造书》和《藏书ABC》带给我近来最开心的阅读体验,这两部书由旅英作家倪蒂和她的大学同窗余彬合作翻译。倪蒂老师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我在报纸副刊时,倪蒂是重要的作者之一,频繁发表她的大作,当时她旅居南非,写了很多关于南非的历史、风土、人情、书事。2019年疫情发生之前,倪蒂旅京,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带着倪蒂、书云(旅英纪录片导演)和新加坡藏书家许忠如(他同时是英国著名珍本书店奎文斋主人)同访模范书局诗空间,我想带他们领略北京最美的教堂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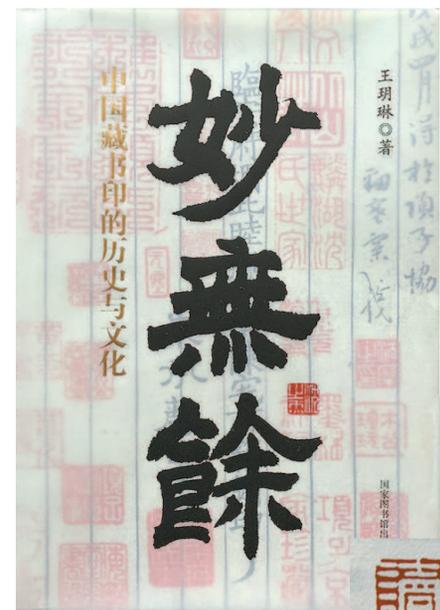
在模范书局,和主人姜寻聊及在书店办一场“中西方藏书论坛”事宜,邀请许忠如和藏书家韦力对谈,并且现场展出许忠如收藏的西方珍本书和韦力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这事就这么愉快地敲定了。没想到不久后,疫情肆虐全球,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2022年1月16日,姜寻在书店库房搬书时意外身亡,让人深深哀痛。

西方“造书”传统

《造书》是一本西方书籍手工装帧艺术名著,初版于1901年,至今已120多年,“依然是行业标杆”。该书系统梳理了手工装帧艺术的历史和流变,及其具体手法和步骤,作者是英国书籍装帧艺术大师道格拉斯·科克瑞尔。

19世纪中叶,机械开始取代手工,延续几百年的西方手工书传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英国艺术与工艺运动领袖威廉·莫里斯于是领导了反机械化、反量产化的运动,很多手工书大师也受到这股运动的影响,纷纷成立手工书作坊,其中,书籍装帧大师托马斯·科布登-桑德森创办的多佛装帧坊很有影响。23岁的科克瑞尔也来到多佛装帧坊做学徒,汲取这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

几年后,科克瑞尔在伦敦著名的书街查令十字街开设了自己的装帧坊,并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校讲授书籍装帧课程。《造书》就源自于他的教学。该书讲述了9世纪至19世纪西方的装帧艺术传统,主要是手工书装帧传统。而这一时段相对于中国,就是唐朝到清朝,也就是从唐朝的“抄本时代”过渡到北宋的“刻本时代”,也就是中国的线装书装帧



《妙手缀珍》 王琳琳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

中国古代藏书印



《造书》 [英]格拉斯·科克瑞尔 著 余彬 倪蒂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藏书ABC》 [英]约翰·卡特 著 余彬 倪蒂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清 吴騫 吴騫读过



清 王芸孙 王铁夫读过

传统。这无疑是本“手工书技术手册”,100多年后,如果您是一位手工书爱好者,按照科克瑞尔书中描绘的步骤,一样可以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手书。在书籍印刷如此快捷的时代,在阅读普遍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提倡反电子化、反快餐化的阅读理念,在手写都成为奢侈行为之时,如果能为自己留存一下手工化的文字记忆,更是疫情时代难得的治愈。

西方“藏书”生态

《藏书ABC》初版于1952年,也有70年历史了。作者约翰·卡特是珍本书商和收藏家。该书已先后出版到第九个版本,再版20多次,是西方珍本书收藏的经典读本。将西书收藏以A-Z的词条方式,做了全面的梳理,每个词条下涉及众多藏书术语,让我们清晰认识藏书世界的丰富多彩和阅读世界的有趣生态。

借由《藏书ABC》中的丰富词条,结合自己平时的藏书和读书喜好,我们来聊聊关于书的那些事儿——

预发本(ADVANCE COPY) 出版商会让推销员(发行人员)带着新书预发本去图书交易会上“预售”,此外,还向书评家、特定书商及读书俱乐部提供。通常是最终的校样或最早开印的书页,多用白纸或印刷纸包装。这些“预发本”可能在内容或装帧上有别于正式版本,自然成为精明的藏书家追逐的对象。

在国内出版界,这种版本叫“试读本”,就是在书正式出版之前,出版社会先印出一些“试读本”,供书评人、媒体和作者的朋友先睹为快,并藉此回馈一些阅读意见等。我多年来有幸获得很多这样的“试读本”,成为我一项数量不少的“主题收藏”。

书志学(BIBLIOGRAPHY) 书志学就是把书籍作为物化的研究对象学问。是藏书家、书商、图书馆员、目录学家和各领域专家的重要参考。西方和日本普遍称为书志学,而在

中国,则叫版本目录学。中国古籍和西方珍本在版本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故而,研究的方法和向度也区别很大。我的藏书和阅读方面,以版本目录学书籍为主,还有中国古代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的各种“读书记”等。

藏书章(BOOK-STAMP) 藏书章用金属或橡胶制成,墨印或盲印在书页、护扉页、标题页或封面上,无论镀金与否,都用金属压膜压制而成。除了藏书印,西方还有藏书票,也是藏书本附加的“收藏印迹”。

相比较而言,中国藏书传统中,藏书章这个元素更为丰富,金石篆刻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藏书章虽然只是金石篆刻中的一个小分类,但也为中国藏书传统留下很大可值研究的空间,尤其对中国古籍的递传研究留下丰富的信息。我将在后面重点分享一本《妙手缀珍:中国藏书印的历史与文化》。

毛边(DECKLEEDGES) 毛边癖(DECKLE-FETISHISM)

毛边指书籍未经裁切的边缘,在现代书籍中,毛边书显得“娇情”,但毛边书却广受藏家青睐,通常一本书只有有限的“毛边本”。而“毛边癖”不由分说对毛边格外恋癖。

毛边书在书籍制作中已成常态,作者通常要求出版社预留一二百本限量的毛边书,用于赠送友朋,自写编号。而旧书平台“孔夫子旧书网”更是毛边书集散地,他们和出版社及作者有着密切互动,通常会要求独家制作和销售毛边本,并且这个生意持续很有热度。

而喜爱毛边书的人,国内称之为“毛边党”,这个群体数量不小,对于毛边书的热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多数爱书人书房,毛边书都占有不小的位置。我家里也藏有很多毛边书,但往往不舍得裁开阅读,需要读的话,另买一本普通本。

此外,书中收录的限量版(LIMITED EDITION)、版本独有特征收藏狂(POINT-MANIACS)、校样本(PROOF COPIES)、独一无二的(孤本)(UNIQUE)等等,都代表着爱书人、藏书家的独特趣味和“人无我有”的暗喜乐趣。

中国藏书印的历史与文化

《妙手缀珍》是藏书印研究家王琳琳作品,深入研究了藏书印的历史与文化,读来打开眼界,如此方寸之间,透露着中国藏书史丰富世界。

中国藏书印和西方藏书票并称为世界藏书史的两朵奇葩。藏书印是书籍收藏者用以标识物权,兼以反映阅读、鉴赏、整理等藏书活动的一部分,让藏书印的印迹留存于书籍之上。藏书印作为官私收藏者的标志性符号,伴随着古代藏书业的兴衰起落,最终获得“藏书必有印记”的广泛认可。

藏书印虽只方寸之间,却与藏书史有着见微知著的密切联系,历代藏书家复杂隐秘的观念和心理,以及古籍真伪、版本递传等等信息,均藉由这一方小天地流传至今。而历代文人、藏书家,也借由藏书印表达个人情感和情怀,精炼的文辞背后,有着历代文人的殷殷心曲和复杂心声。

中国古代文人会玩,光藏书印玩出的名堂实在太多太多了,学者王竟在他的《藏书印与版本鉴定概说》中,将藏书印分为:名号印、堂号印、鉴别印、校读印、观赏印、记事印、仕履印、门第印、里居印、行第印、箴印、吉语印、诗文印、典故印、生肖印、纪年印、官廷印、藩府印、官书印、杂记印等共计20类。

而如此众多类别又可归纳为三大类,即名款印、藏鉴印和闲章。我独爱各类藏书家闲章,闲章更生动地展现古代

文人的志趣、情怀、人生经历和闲情逸致以及无奈和忧伤。

比如有一类“曾在某处”印,就深深表达了藏书家的无奈和失落。再了不起的藏书家,再珍贵的古籍,毕竟陪伴人只有短暂的一生,最终,这些书籍要走进历史,成为别人的度藏。世间万物有聚有散,书尤其如此。“曾在某处”可谓是藏书家自我安慰的一种心理表达,也给后世藏家留下一丝追寻的线索。

这类藏书印较早者有清初藏书家蒋琬的“是书曾藏蒋琬家”。此外,还有李馥的“曾在李鹿山处”、沈懋的“曾在陶啸园沈氏”、鲍廷博的“曾在鲍以文处”、董建德的“曾在旧山楼”、董康的“曾在董氏诵芬室中”、钱天树的“曾藏钱梦庐家”、徐渭仁的“曾为徐紫珊所藏”、刘承幹的“曾藏南林刘翰怡收藏”、周越然的“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周叔弼的“曾在周叔弼处”等等。

在中国藏书史上,有一方字数多达253字的楷书大印,隶属清末藏书家杨拯振,这方藏书印可谓是对古人藏书诸多复杂心理的一种生动表现,录文如下: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日以青箱旧籍,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伏殆希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见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书,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孙。星风堂主人杨拯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修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青,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转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

细读印文,可谓苦口婆心,心情复杂。杨拯振制此印自然也是表达自己的藏书观以及对其书命运的期许:“勿以鬻书,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孙。星风堂主人杨拯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

民国版本目录学家陈登原在其《古今典籍聚考》中,详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古今典籍聚散的自有其源流,古代书籍在历代递传中,历史有起有落,哪怕历经“五厄”“十厄”甚至“十三厄”,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如此丰富的古代典籍,足可见历代藏书家多么可敬,中华文明的传承承担着多么不可磨灭的作用,通过一方又一方藏书印连缀起来,见证一部古书从它诞生起至今的沧海桑田。

三味书屋

“现代性”概念如何完成在中国的“在地性”

——读《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

符晓



《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 赵禹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声于异邦”在21世纪的回响。所不同的是,“现代性”既涉及译介学和传播学问题,又指向哲学、美学和思想史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性”是如何在中国产生的?新时期“现代性”的译介浪潮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怎样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审美现代性是如何终结的?

赵禹冰的《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全面梳理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译介问题,意在重返西方汉译的历史情境,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其概念的本义,及其在离开原产地传播到中国文化场域中所遭遇的种种变形、调适、重组与再造的过程,进而探讨“现代性”概念在新时期中国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起承转合”的关键作用。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从新文化运动到“十七年”等“前”新时期的“现代性”译介;第二章以《文化:中国

与世界》《走向未来》《美学译文丛书》《世界美术》等四部丛书为中心呈现出1980年代“现代性”及其存在方式;第三章强调的是1980年代学界围绕“现代性”产生的“新”困惑;第四章以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译著为中心并旁及中国美学家的理论阐释,凸显出当时中国美学观念发生的转变;第五章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背景重新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德的“现代性”译介,最终指向“审美现代性”的终结。这些内容为读者深入了解“现代性”译介在中国的来路与归宿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索引和理论依据。

首先,《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一方面,作者全面爬梳了1980年代涉及“现代性”的几乎所有材料,其工作量可谓浩繁;另一方面,作者并不囿于材料的呈现和铺展,也极为注意对材料的分析,比如,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周氏兄弟所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

响,进而说明为什么“二周”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译介的起点;再如,作者对波德莱尔“现代性”译介和问题的分析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几乎对相关文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这种以材料为中心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方法奠定了该书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该书呈现了新时期“现代性”译介及相关问题的重要“风景”,揭开了“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作为概念的“现代性”包含能指和所指双重指向,既存在其字面的形象意义,又存在更深层次的语言意义,进一步构成了问题的稠密与深度。因此作者不但关注了译介过程中的能指,而且也不忽视所指。比如作者在言及詹姆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等人的译介时,非常重视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层面总结“现代性”,关心的也是所指。在此过程中,作者又勾连出了更为丰富的“现代性”问题,一是从历史和理论的源流处考察美学汉译的

最初语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相关“现代性”概念的本土话语生成问题,二是从跨文化、跨语际的角度重申在“理论旅行”和“概念旅行”过程中所产生变异、重构、阐释等现象,进而强调概念如何完成在中国的“在地性”;三是以概念为中心勾连出了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内容,梳理了从尼采到利奥塔德的西方“现代性”概念及其转向,称得上是西方美学现代性历史的中国书写。

再次,虽然这部著作是一部文学和美学著作,但是透过文本的肌理可以看到新时期的中国学术史。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存在一个与西方学术前沿问题同步化的倾向。在新时期早期,这种同步化的历程是由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美学译介完成的,因此,该书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别样的新时期学术史。陈来教授曾指出,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

与世界’的文化关怀,‘文化书院’的传统犹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几个侧面”,巧的是,这“几个层面”都涉及“现代性”问题。透过该书,作为思想和学术“行动元”的“现代性”概念一目了然。推而广之,作者经由“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想解决的是更为深广的问题,如其所言,“我们在新时期美学译文中有关‘现代性’的译介与讨论中,看到了有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地域性与全球化、当下与未来、美学与社会实践、都市、环境、人口、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等一系列宏大理论和现实命题,这些都远远超出所谓‘美学’的学科范畴”,但作者也同时指出,这些问题都可以经由美学从最根本的层面给出自己的见解和回应,也足见美学现代性的重要性。

在该书的“余论”部分,作者指出,如福柯、阿多诺、布迪厄、德里达、维特根斯坦、大卫·哈维和阿瑟·丹托等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应该进入到“现代性”译介研究的视野,因为“他们充满锐度和社会关切度的思想以及理论的斑驳与交互回响,混淆了‘现代性’的辨识度也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丰富性”。这说明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时期译文中“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延展性。如果以本书所讨论的截止时间的1992年为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晚近30年来译文中的“现代性”译介及其所旁及的问题与方法将构建出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学术图景。对此,我们拭目以待。